

我的母亲

□冰心

碎碎念

品味过年

□黄杏林

我们的家，确是一个安静温暖而又快乐的家。父亲喜欢栽花养狗；母亲则整天除了治家之外，不是看书，就是做活，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息。小伙伴们到了我们家里，自然而然地就会低下声来说话。然而她最鼓励我们运动游戏，外院里总有秋千、杠子等等设备。我们学武术、学音乐(除了我以外，弟弟们都有很好的成就)。母亲总是高高兴兴的，接待父亲和我们的朋友。朋友们来了，玩得好，吃得好，总是欢喜满足地回去。却也有人带着眼泪回家，因为他想起了自己死去的母亲，或是他的母亲同他不曾发生什么情感的关系。

我的父亲是大家庭中的第三个儿子。他的兄弟姊妹很多，多半是不成材的，于是他们的子女的教养，就都堆在父亲的肩上。对于这些，母亲充分地帮了父亲的忙，父亲付与了一分的财力，母亲贴上了全副的精神。我们家里总有七八个孩子同住，放假的时候孩子就更多。母亲以孱弱的身體，来应付支持这一切，无论多忙多乱，微笑没有离开过她的嘴角。我永远忘不了母亲逝世的那晚，她的床侧，昏倒了我的一个身为军人的堂哥哥！

母亲又有知人之明，看到了一个人，就能知道这人的性格。故对于父亲和我们的朋友的选择，她都有极大的帮助。她又有极高的鉴赏力，无论屋内的陈设、园亭的布置，或是衣饰的颜色和式样等，经她一调动，就显得新异不俗。我记得有一位表妹，在赴茶会之前，打扮得花枝招展的，到了我们的家里。母亲把她浑身上下看了一遍，笑说：“元元，你打扮得太和别人一样了。人家抹红嘴唇，你也抹红嘴唇，人家涂红指甲，你也涂红指甲，这岂非反不引起他人的注意？你要懂得‘万朵红莲礼白莲’的道理。”我们都笑了，赞同母亲的意见。表妹立刻在母亲妆台前洗净铅华，换了衣饰出去。后来听说她是那晚茶会中被人称为最漂亮的一个。

母亲对于政治也极关心。三十年前，我的几个舅舅，都是同盟会的会员，平常传递消



息、收发信件，都由母亲经手。我还记得在我八岁的时候，一个大雪夜里，帮着母亲把几十本《天讨》一卷一卷装在肉松筒里，又用红纸条将筒口封了起来，寄了出去。不久收到各地的来信说：“肉松收到了，到底是家制的，美味无穷。”我说：“那些不是书吗？”母亲轻轻地捏了我一把，附在我的耳朵上说：“你不要说出去。”

辛亥革命时，我们正在上海，住在租界旅馆里。我的职务，就是天天清早在门口等候，母亲看完了报就给我们讲。她还将她所仅有的一点首饰换成洋钱，捐款劳军。我那时才十岁，也将我所仅有的十块压岁钱捐了出去，是我自己走到申报馆去交付的。那两纸收条，我曾珍重地藏着，抗战

起来以后不知丢在哪里了。

“五四”以后，她对新文化运动又感了兴趣。她看书看报，不让时代把她丢下。她不反对自由恋爱，但也注重爱情的专一。我的一个女同学，同人“私奔”了，当她的母亲走到我们家里“垂涕而道”的时候，父亲还很气愤，母亲却不做事。

客人去后，她说：“私奔也不要紧，本来仪式算不了什么，只要他们始终如一就行。”

她对我的弟弟们的择偶，从不直接说什么话，总说：“只要你们喜爱的，妈妈也就喜爱。”但是我们的性格品味已经形成了，妈妈不喜爱的，我们也决不会喜爱。

她已死去十年了。抗战期间，母亲若还健在，我不知道

她将做些什么事情，但我至少还能看见她那永远微笑的面容，她那沉静温柔的态度，她将以卷《天讨》的手，卷起她的每一个儿子的畏惧懦弱的心！

她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，至少母亲对于我们解释贤妻良母的时候，她以为贤妻良母应该是丈夫和子女的监护者。

关于妇女运动的各种标语，我都同意，只有看到或听到“打倒贤妻良母”的口号时，我总觉得有点逆耳刺眼。当然，人们心目中“妻”与“母”是不同的，观念亦因之而异。我希望他们所要打倒的，是一些怯弱依赖的软体动物，而不是像我的母亲那样的女人。

(本文摘自冰心《关于女人》，部分段落有删节)

心机学

父亲的地窖子藏的是地瓜，孕的是亲情

□张伺

运河边，父亲还在用地窖子窖藏地瓜，在四里八村已不多见。我儿子说：爷爷你太“out”了。可喝起地瓜米粥，他却像只贪吃的小兽，每次肚子被撑得圆滚滚的。

下地窖子，父亲不让儿

父亲已六十有六，种着半亩地瓜。地瓜种在老河滩的沙土地里，黄沙瓤，面甜皮薄，无筋无丝。老河滩里几十亩地，淤土沙土都有，好像只有那块地能长这样的地瓜。

二十多年前，乡下老家几乎家家都有地窖子。这些地窖子多半掏在老运河堤上，几米深浅，口圆而小，只容得一人上下，底下却豁然，能容得下一头牛，对着面再各挖出一米左右的藏洞。如今地窖子被废弃了，十里八乡好像只有我家的地窖子还在用。那些出窖子的地瓜像出土的文物，父亲稀罕着哩。

掀开一块石盖板，地窖子里顿时冒出湿漉漉的热气。父亲要让我带一些地瓜回城。我伸头看下去，黑咕隆咚的。

父亲不让我下去，坐在窖子口上，对我说看见绳动就往拉，别使劲愣儿。父亲双臂一挺，腿打着晃垂下去，就将

身子吊进了窖子。父亲缓慢地在窖子里下移着，钉在窖子沿儿的双手不见了，上身隐入窖子里了，头隐入窖子里了。父亲消失在窖子里的黑暗中。这时候我不敢出声，关心则乱。我跪着，双手扒住窖沿儿，把头伸向窖子里。

我的心吊着。一团黑影下移着，我的心倏地战栗起来。我瞅着那团无法融进窖子中黑暗的那团黑。因为那团黑有着温度和声音，那团黑揪着我的目光。我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，那团黑说放筐。虽然沉闷模糊，我知道那团黑已经落到了窖子底。我的眼睛濡湿了，小心翼翼地放着筐。直到窖子底亮起一团光，父亲打开了筐里的手灯。

绳子像蛇一样抖动着，“起筐！”我一度一度拔着绳子。眨眼间，一筐地瓜就吊出来了。有了晃动的微光，我的眼睛急切地捕捉着那团黑。虽然那团黑更浓了，但我没了刚才的恐惧与不安。

那团黑是

我一生的牵挂

几筐地瓜吊上来，父亲也要上来了。我盯着窖子里的那团黑缓慢上浮着。先是父亲伸出的双手，手指甲下浸满黑泥土。接着花白的头晃动着浮上



来。父亲的头发越发稀疏，头顶蹭满了土与蛛网。脸上满是汗水，有汗顺脖子流下来。父亲衣服上也沾满了土。

我帮父亲拍打着衣服上的土，顺势挨在石盖板上陪父亲坐一会儿。父亲喘着粗气看了一眼窖口旁的一堆地瓜，笑了。父亲真的老了，往常他出窖口就会起身拾掇，而现在他要多一会儿喘匀气。但父亲那一抹微笑和眼神里，掩藏着满足和高兴。

其实上下地窖子并不容易，窖子壁湿滑，窖口的一两个蹬坑都会结冰，滑腻而坚硬。蹬坑已被蹬踏二十多年，蹬窝早已浅平，在黑暗中，只能用脚尖试探着找，倘若一脚蹬空……但父亲不会失脚，他说自己的脚尖已长出眼了。即便一脚打滑蹬跳了，双手和一只脚会牢牢地钉住自己。即

便另一只脚打滑蹬跳了，双手也会抠紧窖壁，手指抠进窖壁的土里，而掌根紧紧顶在窖壁上，身子悬空，但双脚瞬间就会找到蹬坑。这是父亲的本事，而我无法拥有。

起风了，天凉下来。春节的鞭炮声已在四下响起。父亲的汗已收，我帮父亲披好大棉衣，拾掇好地瓜。我一步也不想离开父亲。而岁月不会停留在此刻。在父亲下到地窖子的那阵子，我在上面蓦地发现，我是那样孤独无奈，需要依靠那团黑和绳子的抖动才能确认父亲的存在，当我连那团黑也看不见的时候，那阵抖动就钳住了我疼痛的神经。我终于明白有多担心就有多疼，就有多爱。

地窖子的那团黑和那个沉默寡言的人是我一生的牵挂。

欢欢乐乐过大年。我从妈妈的女儿，成为儿女的妈妈，又从奶奶的孙女，熬成孙子的奶奶，大年已过了七十多个，仍年年盼，年年忙，年年乐。但仔细品味起来，年里有深深的时代印记，也有鲜明的人生体验，人在不同年代，不同年龄段，过年的滋味还真不一样。

童年时，衣食都由父母操持，年货都由父母采买，应酬都归父母打点，过年对我来说，就是无忧无虑地坐享其成，而且是全年之最。过了腊八，我就一门心思盼年，充满了孩提时代的纯真味儿。因为只有到了过年时，才能集所有期盼的好事之大成：穿新衣、戴新帽、赏花灯、放鞭炮、逛大街，吃得过瘾，玩得开心。过年是一年里最热闹最欢乐的日子，能不热盼吗？可一过了正月十五，就像最喜爱的玩伴远走了一样，心里充满了留恋和失落，总觉得距离下一个新年是那么漫长而遥远。

少年时，正值上世纪五十年代，那是一个鼓足干劲、力争上游改天换地的火红年代，过年都充满了革命味儿，舍弃了许多传统的讲究，不提倡旧时的风俗，一切从新从简。特别是1958年以后，农村一到冬季农闲就大修水利，城市里，各行各业也都大干快上，搞革新上项目，当时春节最响亮的口号是“干到腊月二十九，吃了饺子再下手”。我们青年学生，年前年后也忙得不可开交，中小學生要协同街道，不是敲锣打鼓慰问烈军属，就是送米送面照顾困难户，再就是手抱扫帚清扫大街小巷。大学生要配合省、市宣传部组成演出队，进工厂、到农村、下连队，慰问工农兵。我们一家人，常常在初一吃了饺子就各忙各的去了。那时，大年初一兴团拜，所有人都到单位，或举行仪式，或开茶话会，相互拜年，相互祝福。刚实行团拜时，大家都觉得有一种新鲜、团结、热闹的革命大家庭的味道。这种过年形式一直延续了好多年。

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经历了最困难的岁月，也经历了最荒诞的时期，不过，困难和动乱都阻止不了大年的脚步，年还是如期而至，只是味道，有些清贫、清淡、清苦。

1961年，我到北京接怀着8个月身孕的姐姐来过年，那正是大歉年时期，物资供应奇缺。姐姐为了能给父母和孩子过年准备些食品，就把好几个月的供应从嘴里省下来，积攒起来往回带。她把放不住的肉馅蒸成包子，又带上北京春节供应的所有东西，包括白面、大米、鱼、肉、白糖，还有她自己早准备好的冻豆腐等，让我用四个旅行包一股脑背了回来。虽然是坐火车，可光上下车的路，也够我一个人扛的，回到家一看，我的双肩都肿得老高。累是真累坏了，可我心甘情愿，从那以后我知道了上有老、下有小的辛苦和责任。

我做了母亲后，就暗下决心，每一年我都要尽力让我的妈妈和孩子们过得像模像样。可决心是决心，现实是现实，在那种实行票证定量供应的年代，过个好年，谈何容易？从过完这个年，我就要开始筹划和准备下一个年。调度着一年的供应，积攒着一年的布票、棉花票，按月存储5块钱，作为零存整取的春节专用资金。只有筹划好了，才能保证过年时全家人都能穿上我亲手缝制的新衣，吃上可口一点的传统年夜饭。现在想来，当时我作为一个母亲、一个女儿，辛辛苦苦地忙年，那才是快乐十足的年味，那种味道里，有幸福，有甜蜜，有满足，还有自豪。

改革开放后，国强民富，生活一天比一天富裕，我也升了辈分，当了奶奶。如今过年，越来越红火，越来越讲究。儿孙满堂了，年货丰富了，气氛浓烈了，我过年的心气也越来越高了。现在，我非但不用再操持一家老小的衣物，反而早就开始坐收孩子们的各种高档礼物。不过，趁着我和老伴身体还行，我们还是一如既往地为儿孙们忙年，为孩子们准备各种年货，蒸、煮、烹、炸各种传统美食，摆鲜花，贴福字，眼巴巴盼着儿孙们回来过个幸福年。

人到老年，觉得一年一年过得太快了。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，国泰民安，团团圆圆，和和美美，就是最浓最美的年味儿。